

洪秀全的侄子闹起义

洪全福，字其无，原名洪春魁，是天王洪秀全的族侄，幼年随洪秀全参加太平天国起义被授予瑛王爵位。太平天国失败后，洪全福逃往香港，加入香港义和堂航业会所。兴中会会员谢缙泰因其父谢日昌与洪全福过从甚密之故，结识洪全福，希望借助洪全福的地位和军事经验，组织力量，夺取广州。

谢缙泰于惠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组织工作，并介绍香港富商李纪堂参加兴中会。同时，加紧联络会党，计划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

1851年 12月 12日，由谢缙泰出面邀请洪全福、李纪堂商议，共推洪全福为首领，以示继承太平天国之遗愿，号召广东洪门兄弟起义，并议定起义成功后，建号“大明顺天国”，由李纪堂承担全部起义费用，洪全福欣然接受。

计划确定，谢缙泰、洪全福分头准备。谢缙泰主要是进行争取国际援助和进行舆论宣传工作。他先后联系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香港日报》编辑肯宁汉、《德臣西报》编辑黎德、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谢缙泰起草了《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申明纪律告示》、《安民告示》、《四言安民告示》等，申明：“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此外，还起草了宣言和呼吁书。

为了发动会党，谢纘泰打出了“大明顺天国”的旗号。洪全福更以主要精力进行军事准备。1911年 苑月，洪全福设立大明顺天国总机关于香港，对外用“和记栈”名称作掩护，洪全福自称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任命兴中会会员梁慕光为南粤兴汉大将军府广州起义军总司令，任命兴中会会员李植生为南粤兴汉大将军府总参谋，积极筹备起义计划。

此后，洪全福委派宋居仁、苏焯南、黄大汉、林海山、曾捷夫等负责联络各地会党与新军，并设广州起义军总机关于广州同兴街信义洋货店，在珠江南岸的下芳村设立继业公司贮藏枪械军服等军需用品，起义军在城内设立分机关二十余处，积极准备起义。同时，向沙面陶德洋行订购大洋十万元的枪支子弹。起义计划于 1911年 11月 13日（除夕）夜举行，由惠州起义军牵制清政府陆军提督之兵，东莞起义军牵制清方水师提督之兵，广州起义军则兵分五路进军：一军攻打东北门，以抗拒清军；一军攻打西门，夺军械厂，焚烧火药库；一军扼守惠爱、五约等处，抵御满洲旗军；一军炸毁万寿宫，杀戮齐集于此的大小官员；一军在新城，策应各路起义军。

1911年 11月，起义工作积极进行，各路兵马按计划进入广州。洪全福乘小火轮从香港抵澳门，到香山指挥起义事宜。不幸的是，在这次起义发动前两天，有奸民向香港警察厅告密，于是和记栈被搜查，有缘名党人被捕，并搜出

会党簿据和大明顺天国告示，以及港穗机关间的来往信件等。另外，广州沙面陶德洋行在收了货款十万元以后，因为不能如期交货，也向清军捷字营管带杨植生告密，起义事机被泄。

清两广总督德寿派遣兵勇围捕革命党人机关，搜获旗帜、号衣、刀斧、食品无数，梁慕信、陈守灵、李秋凡等二十余人被捕，梁慕信等 50 余人牺牲，谢纘泰、梁慕光、李植生等人不得不退回香港，洪全福化装脱险，逃到新加坡。起义军被迫解散，起义最后失败。因为这次起义发生在光绪二十八年，即壬寅年，故又名“壬寅广州起义”。

洪全福起义以“反清”、“开新国”为号召，具有一定的革命色彩，是继孙中山领导惠州起义之后，兴中会会员领导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圆猿大阪博览会事件

圆猿年 圆月 猿日，日本新闻界披露，大阪博览会设立人类馆，展览期间，将雇请“台湾之生番”在馆内“演习其固有特性及生息之程度、阶级，并其恶风蛮习等，以供观览。”对中国的缠足结辫习俗进行肆意的丑化。消息传开，留日中国学生群情激奋，许多人写信到中国内地，并找到中国在大阪经商的孙实甫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对于这种恶毒丑化中国的行径不能听之任之，决定由大阪中国商务团体出面向日本大阪博览会方面进行严正交涉，要求取消该项展览，并声明，如日方拒不撤销，我大阪华商将拒绝参加该博览会，并在博览会开会的第二天举黑旗志哀以示抗议，日本方面被迫让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猿月 猿日，秦毓鎏、陈去病、蔡文森、侯保三等中国留学生从东京到大阪参观博览会，发现福建省的陈列品竟然附设在台湾馆中。台湾本来是中国领土，但自甲午战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将其强行割占，而且日本还通过台湾进而觊觎中国东南沿海，在世纪交替时期那场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竞争中，划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公然视福建为己有。现在福建陈列品附设在它的殖民地台湾的陈列馆中，当然不是出于疏忽或什么巧合了。因此，秦毓鎏等人当即向会中执事抗议，博

览会方面则以福建物品无地陈列为由敷衍。于是秦毓鎏等人找到湖北出品委员候补道桑宝，想请他出面力争，但桑宝却认为中国国势微弱，不可因小事得罪邻邦，借词推诿，不肯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秦毓鎏等人只得自己想办法。他们一方面致电东京留学生会馆，要求派代表前来抗争，一方面约见博览会高级人员，要求将福建陈列品移到湖北馆，如确实不能，宁可撤回。并声言：“我辈学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如博览会方面不自行移出，将要敲碎玻璃窗柜，强制移出。猿月 员缘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派遣的代表刘崇杰、林长民等人也赶到大阪，与博览会当局进行严正交涉。他们重申中国方面不惜挑起国际冲突，坚决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并展开外交手段，晓之以利害，奉劝日本不要因小失大，与我爱国学生对抗而导致盛大的博览会功败垂成。最后，日本方面被迫将福建陈列品从台湾馆迁出，留日学生在这次因大阪博览会引起的交涉中取得最后胜利。

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东部、同属黄种人，并且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同文同种，东亚联合”之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鼓吹非常积极，在中国当时朝野人士中也是市场广阔。实际上，日本正是利用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地域优势妄图侵略中国。大阪博览会事件因日本方面歧视丑化中国人，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以及显露出其进一步侵华野心而引起纠纷，虽然规模不大，也没有进一步演化为反日运动，但它在当时国人一片中日亲善的声浪中，却是不同凡响。

猿摇英俄阴谋争夺西藏

1904年 圆月 15日，英俄在伦敦谈判西藏问题。俄国政府听说英国锡金行政官怀特所率领的远征军已到达西藏境内的康巴乌华列夫，正取道春丕向北进发，势将控制整个西藏，影响到俄国在西藏的利益，阻碍了俄国在西藏发展势力范围，因而命令其驻英公使本坚多尔夫伯爵，照会英国外务部，提出两国进行谈判和交涉。圆月 15日，俄国公使本坚多尔夫与英国外务大臣兰斯顿勋爵举行首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圆月 15日，英俄继续谈判西藏问题。兰斯顿声称印度政府对俄方送致外务部的照会深表惊异，指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实有特殊性质。他还出示中亚细亚地图向本坚多尔夫指称：“拉萨去印度边境比较无多大距离，反之距俄国亚细亚之属地，则远在 1000里以外。故俄方如在此种直接毗连大英帝国领土之区域表现任何关注或行动，势不能不引起当地人民惊异之感，或将构成一种印象，以为英国势力已在退却中，俄国反突飞猛进于上述地区，而此等区域前此悉在俄人势力范围以外，这是一般公认的。”兰斯顿并声称，英国与西藏关系密切，俄国若派兵西藏，英国必仿效而为。由于英国的态度强硬，英俄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终于中断。

源 作曲家沃尔夫去世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各国音乐都在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同时，多少都受到了瓦格纳的影响。威尔第是意大利作曲家当中最显赫的人物，他的作品也是最富有意大利风格的，虽然他没有被瓦格纳的观点所左右，但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普契尼则采用了许多瓦格纳的创作方法。瓦格纳几乎征服了全欧洲，尤其在德国和奥地利，谁如果不采用瓦格纳的创作方法，他就不能被称为新时代的音乐家。

瓦格纳的创作原则主要在歌剧方面，但他所开创的创作原则，很快被推广到音乐的其他领域。首先是奥地利的以质朴著称的音乐家布鲁克纳，他把瓦格纳的创作原则应用到交响曲的创作方面，他写有九部交响曲，都是以瓦格纳的创作原则写成的名曲，并且得以在各国上演；另一位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沃尔夫，则把瓦格纳的创作原则应用到歌曲创作方面，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沃尔夫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歌曲；此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歌剧和器乐曲。他那优雅、抒情的歌剧可以和舒伯特的歌曲相媲美；他的器乐曲也非常有个性而且优美动听。这些都是他沿着瓦格纳的创作道路写成的。这些作品极富有创造性和洋溢着作曲家的灵感。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每当沃尔夫谈到他的艺术生涯时，他总是这样说：“我的名字叫雨果·沃尔夫，我生于1894年猿月猿日，至今还活着。这就是我的传记的全部。”

沃尔夫是个性格直爽的汉子，他一生都热衷于音乐事业。

雨果·沃尔夫1894年生于奥地利格莱茨市。他的父亲是皮革商，生活比较富裕，非常热爱音乐，喜欢小提琴胜过他的皮革，喜欢钢琴和吉他胜过他做生意。每当傍晚，他便拉起小提琴、弹起钢琴或者吉他，有时也自弹自唱。沃尔夫最初学音乐是由他父亲教的，他进步得非常快，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便能参加家庭音乐会了。

他父亲从未考虑让沃尔夫将来从事音乐事业，他首先考虑的是沃尔夫需要受普通教育。缘岁时，父亲便送他上小学，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好。源年以后上高级小学时，沃尔夫除了音乐以外，其他课目的成绩都很差，可是他又高傲又固执，后来被学校开除，转学以后，又因同老师吵架而自动退学。沃尔夫除了考虑音乐以外，什么也不考虑。他伯母见他醉心于音乐，便于1897年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同住，并送他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那时沃尔夫13岁。

音乐学院的学习空气非常沉闷呆板。和声方面只学最基本的理论而不结合实际；钢琴方面也从不教艺术作品。少年沃尔夫在这里感到无聊之极。那时，恰逢瓦格纳来到维也纳，指挥自己的作品《汤豪舍》和《罗恩格林》的演出。13岁的沃尔夫听了演出以后，完全被瓦格纳的作品吸引住，又被他的创作方法所折服，他梦寐以求的是希望瓦格纳对他进行指导。一天，他来到瓦格纳居住的旅馆，可

又踌躇不前，他在那里徘徊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拜见了瓦格纳。瓦格纳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从此，沃尔夫便成为瓦格纳的崇拜者。

1856年，音乐学院骚动起来，本来这与沃尔夫没有多大关系，但他被学校看做闹事的主要分子而被学校开除了。他本来对学校没抱多大期望，便决心离开学校努力自学。幸而他伯母的生活还不算十分困难，供他生活不成问题，但无力供他买乐谱和文艺书籍，这就不得不靠他自己出外劳动了。

沃尔夫除了崇拜瓦格纳以外，对贝多芬、舒曼和柏辽兹也都非常崇拜和敬慕。他为了能更多地买到他所崇拜的音乐家的乐谱，每天晚上到舞厅弹钢琴。他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他却不善于安排生活，因而生活仍很贫困。后来他离开了伯母家，生活就更加困难。最后，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给他介绍了几个学生，他便以教学维持生活。

1857年年底，沃尔夫在朋友的帮助下，谋到了在萨尔茨堡剧院任副指挥的职务，于是他带着他的全部财产和瓦格纳的石膏像，到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赴任。他在那里教合唱或指挥演出。他是个执拗和古怪的人，时常同别人争吵。有时，他被清晨的熙来攘往的马车鞭子声吵醒，于是，他便穿着睡衣跑到街上，愤怒地大声斥责马车夫说：“马车夫、搬运工和看门人，你们的吵闹声不要妨碍行使人类最高使命的人的休息。”说完，他便得意洋洋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有这样古怪性格的沃尔夫，不适宜做指挥工作，猿个月后，因同经理吵架而回到维也纳。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沃尔夫回到维也纳以后无处栖身，只好租赁一个肮脏的亭子间来安身。在这里，他根据克莱斯特的小说写成交响诗《潘台西里亚》。这时的沃尔夫只有 23 岁。

沃尔夫因生活穷困潦倒，曾试图到美国碰碰运气，后经朋友的介绍，他进入维也纳的《沙龙报》撰写音乐评论。从 1885 年开始，他连续三年，担任评论员的工作，但在这里沃尔夫也没取得多少成就。他过于固执，除了极力宣扬自己所喜爱的瓦格纳派的观点以外，对其他的人，则犹如对待吃人的野兽一般猛烈攻击，因而树敌过多。沃尔夫攻击歌剧院指挥是“只会打拍子”或说他只不过是一架“节拍器”而已。攻击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如同“音乐里的噪音”。由于他如此刻薄地责难别人，音乐界对他十分憎恨。

但沃尔夫仍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纯洁青年，而且他在音乐方面有着超人的异常才能。他的好友虽然不多，却都很支持他。他从《沙龙报》辞职以后，便住在维也纳郊区朋友的别墅里，他在那里作曲和发表了为数不多的作品；他还曾几次到德国拜罗伊特去听瓦格纳的音乐剧，此外便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

沃尔夫写了大量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写的歌曲。1885 年，他以缪里克诗篇写了歌曲 2 首；1886 年和在这以前，他又以艾兴多夫的诗篇写成 4 首歌曲；1887 年到 1889 年，他又以歌德的诗篇写成歌曲 2 首；1890 年到 1894 年，以海泽和盖贝尔的诗篇写成的歌曲 2 首，命名为《西班牙歌曲集》出版；1894 年至 1895 年，以海泽的诗篇写成歌曲 2 首，命名为《意大利歌曲集》出版。在这些歌曲中，至今仍有不少歌曲为人们传唱，如以

缪里克的诗写的歌曲《妖精之歌》、《祈祷》、《隐居》、《被遗弃的少女》、《乡愁》、《古画》、《再见吧》、《春之歌》和《瓦伊拉之歌》等等，都是极为著名的歌曲，其他歌集也同样驰名于世。

这些歌曲色彩鲜明、生气勃勃，有时以朗诵的曲调，有时又以民歌风格，寓意深刻地表达诗的诗境。沃尔夫非常准确地用音乐来表现诗歌的精神实质，这不但反映在歌曲旋律上，也反映在钢琴伴奏上。钢琴不仅作为伴奏声部，也是一首完整音乐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他运用瓦格纳的创作手法，精心细致地创作出来的音乐。

沃尔夫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出了这些歌曲。他的创作力是超人的，他每天至少写猿首歌曲。这位天才作曲家，除了写歌曲之外，还写了一部歌剧《市长》和歌剧《玛缪尔·威那嘎斯》的一部分；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管弦乐曲《意大利夜曲》等。

然而，天才往往变成疯子的事例并不少见，沃尔夫的性格本来就跟普通人不一样。1897年的一天，非常疲倦的沃尔夫辗转不能入睡，在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下，他语无伦次地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这时他的双眼异常明亮，穿着不协调的衣服。当朋友们闻讯赶来问他怎么回事时，他回答说他很健康，可是任何人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肯定他是个疯子，于是立即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

1898年11月，沃尔夫的病势稍有好转，便出院到外地作短期旅行。不料那年12月他忽然跳进特拉曼湖，当人们把他救出来以后，再次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后来他又中风，舌头僵硬的卷不起来，手脚也不灵便。沃尔夫在精神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病的折磨下，终于在 1827 年 3 月 26 日停止了呼吸。临死前，他紧紧地握着护士的手。终年不满 35 岁。

两天以后的 3 月 28 日为沃尔夫举行葬礼。参加葬礼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汇集在教堂里向他致哀。第二年 4 月，人们为死去的沃尔夫建立起一座雄壮的墓碑。沃尔夫一生呕心沥血所创造的音乐价值，也逐渐被世人所承认。

1912年 作家兼革命家伏契克诞辰

1912年 1月 1日，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上了捷克国土。在捷克共产党的领导下，捷克人民展开了顽强的抵抗运动。共产党员、新闻工作者伏契克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民族利益，他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参加和组织抗击法西斯的地下斗争。1941年 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盖世太保投进监狱。

1912年 1月 1日，伏契克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儿童和少年时代他在工人区度过，从小熟悉无产者大众的悲惨生活，立志为改变父兄生活境遇而奋斗。1928岁那年，他加入了刚诞生不久的捷克共产党。他从查理大学文学院毕业后，直到被捕，一直在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工作。他曾两次去过苏联，写出大量歌颂苏联新生活的报道，为此反动政府当局多次将他投入监狱。1939年以后，捷克的独立日益受到法西斯德国的严重威胁。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出卖了他的祖国，他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战斗热情写出许多政论文章和传单，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的阴谋，号召人民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利益拿起武器和敌人战斗。这些文章后来收入《我们爱自己的民族》（1958年出版）一书。除此之外，他还从事捷克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评价文学作品，为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伏契克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知道一旦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就没有生还的可能。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法西斯杀害，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难友们在痛苦中呻吟。他觉得应当把人类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世界人民真正认识到法西斯的丑恶面目。

伏契克得到狱中看守人的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了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经常被敌人拉出去拷打，逼问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他用沉默来回答敌人，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摧残。他把对敌人的仇恨集中在笔头上，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写下去。《绞刑架下的报告》共分八章，包括伏契克在狱中的生活情况、囚犯们的生活和思想活动情况、盖世太保的形象等。伏契克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骇人听闻的拷打和迫害，但他始终没有失掉对胜利的信念。他组织难友们向法西斯匪徒进行斗争，在死神临近的时候，他毫不畏惧，挥笔写道：“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战斗，我们将要为欢乐而死。让悲哀永远不同我们的名字联在一起。”他在最后用生命的激情呼喊：“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1958年，伏契克被法西斯匪徒残酷地杀害于柏林的勃洛琛斯监狱中。他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在德国法西斯土崩瓦解后的1958年，在捷克出版，很快这本书被译成八十六种语言，在全世界迅速传播。捷克解放后，伏契克被追认为民族英雄。

遥明德学堂开学了

1903年猿月圆日，胡元倓创办的长沙明德学堂开学。胡元倓字子靖，别号耐庵，湖南湘潭人。他于1900年以拔贡生选送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教育，与黄兴同学，私交很深。胡元倓在日本非常敬慕福泽谕吉创立庆应义塾的成就，决意兴学救国。第二年归国，得到湘中耆宿在籍侍郎龙湛霖的帮助，在长沙倡办明德学堂。起初租赁湘春街左宗棠祠为校舍，招中学甲、乙两班学生共100人，自任监督。聘黄兴、谭延闿、周震鳞、张继、秦毓鎏、王正廷、苏玄瑛（曼殊）等为教员。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并且大半是革命党人，革命思想因而得到传播，所以，此后湘鄂革命人物多出自明德学堂。胡元倓为国育才，1904年如一日，校誉之隆，人才之盛，与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南开学堂，被誉为南北两大著名私立学府。不久，胡元倓又与龙湛霖、谭延闿另立经正学堂。1905年增设高等小学两班，教学中提倡中西学科并重。黄兴以学堂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准备于这年12月12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在长沙起义，起义计划泄露后，他帮助黄兴赴上海躲避。胡元倓1905年东渡日本任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年底辞职回国，仍致力教育事业，于1906年合明德、经正为一校。1908年在北京设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1910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年明德大学停办，以示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不满。1913年愿月在汉口复设明德大学，1914年缘月停办小学部，1915年愿月又停办大学部，专办明德中学，后来成为全国著名中学之一。1916年员月将校址迁至湘乡奥霞岭乡曾氏宗祠。

袁国年湖南湘利黔织布厂建厂

袁国年春，湖南湘乡人禹之谟在湘潭租用西昌会馆，创办织布厂。

此前，禹之谟曾在长沙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袁国年“自立军”遭破坏以后，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袁国年袁国月，他“愤事不成，拂衣东渡，念所以救国者，以为空言不足求也。”在日本，他“屈身躬纺织之业”，到东京千代田等工厂实习，掌握操作和维修技术。袁国年春，他携带所购织机回国，并于同年夏天自筹资金，在安庆办起“阜湘”毛巾厂。后因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而被清政府追查，便关厂潜回家乡。

禹之谟给湘潭的织布厂定名为“湘利黔”，黔指一般平民，意即有利于湖南民众。该厂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有的机件由禹自己设计制成。对工人的挑选十分审慎，人数不足袁国名。厂内生产毛巾和布匹，其产品经过漂白、印花、熨烫、包装，同进口的货色差不多，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深受当地人欢迎。由于厂小，产量有限，其产品往往供不应求。

这时，禹之谟感到湘潭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地区，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便与好友曹亚伯商定迁厂至长沙。

袁国原年夏，湘利黔织布厂迁到长沙，最初设在小吴门